近日，首届“花厅论坛·花厅遗址与饮食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新沂市举办，与会学者围绕江苏地域文明探源、花厅遗址考古、生物考古视野下的中国古人饮食等课题展开探讨。本报记者来到新沂，跟随考古学者的脚步，聆听泥土之下传来的文明絮语。

花厅叙文化交融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这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串饰，出土于花厅遗址M60位置。

这件珍品由14个环、3个璜、2个佩和5个坠一共24件串连而成。该珍品所有组件皆由呈棕红色带黄褐色花斑透闪石软玉精磨。

14件玉环皆作扁平圆形，表面磨平抛光，制作精巧细致。

制作最为精致的是玉色鹅黄带褐斑鸟纹玉佩。其中的一件外廓略作平行四边形，正背两面的四角有以浮雕手法精琢的小鸟，一面4只，两面共8只。画面形象为左右两鸟相向而伏，一大一小。如从侧面看，正背相对应的两鸟合为一只立体的伏鸟，鸟身厚0.5厘米，又可视为圆雕。

同时存在两种文化类型

4月中旬，徐州的天气在仲春一场细雨过后略显凉意。沿新沂南站一路向南行驶，由235国道转向山水大道，花厅遗址的文保标志碑就矗立在路旁一片田野之中。新雨滋润草木新芽，夹混着泥土芳香，仿佛将人的思绪拉入了久远的历史长河。

距今5000多年前，位于苏北鲁南交界处的新沂花厅是一个神秘的聚落，来自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文保标志碑上的文字显示，南起花厅村、北至徐庄北、东至北沟圈子、西至吴山头的数十万平方米区域，都是花厅聚落曾经覆盖过的范围。

花厅遗址于20世纪50年代初被发现。作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重要聚落遗址，这里的出土器物既有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又存在良渚文化的特性，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由此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这样的文化交融究竟是战争引发还是迁徙造成？抑或是和平共融？

据介绍，花厅遗址主要由墓葬分布区和遗址居住区组成。墓葬区可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时期，北区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时期。在南区，共发掘了20多座墓葬，墓葬规模较小，一般以单人葬为主，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主要器物包括凿形足鼎、镂空座豆等，出土玉器以环、琮、管、坠和镯为主。

与南区墓葬相比较，北区墓葬规模明显更大，等级更高。不仅随葬品丰富，还发现了早期的人殉人祭实证，说明在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基本形成。60多座墓葬大多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包括瓦足鼎、罐形鼎等。

很大一部分遗址尚未探明

在学术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分别以“考古说煎饼”“花厅遗址的学术价值”“花厅——南北文化交融的中枢”“由花厅遗址引发的三点思考”为主题进行演讲。

“目前已发掘的区域仅仅是花厅遗址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遗址尚未探明。”黄建秋表示，应该进一步从考古学角度做好花厅遗址的调查工作，分期、分批进行勘探，摸清地下遗址状况。在他看来，虽然全国兼有南北文化要素的遗址很多，但花厅遗址非常典型，在汇聚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因素的同时，这里还有薛家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其他文化因素。

“花厅遗址本身位于苏北地区，现在看来离海比较远。但是，如果考虑海平面的变化，当时的花厅会不会离海更近些？”黄建秋猜测，当时离海较近的花厅土地肥沃，人口相对密集，由此成为了南北文化交融的枢纽。

栾丰实表示，花厅遗址墓葬无论是从墓室规模、还是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值得关注。“墓室面积很大，随葬品数量很多、玉器也很多，存在殉人现象。”他认为，大汶口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区域，与南方的良渚文化、中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一样，是多元、并行、相对独立的。花厅遗址可以体现出从原始发展到文明，从部落进入更高阶段的过程。

与会学者表示，出土自花厅遗址的大量猪、狗骨架与陶、玉器，展现了花厅先民的饮食生活与日常工艺水平。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花厅先民的生活面貌被一点点还原。

链接

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再到2010年前后，考古学者在花厅遗址先后进行过7次考古发掘，陆续清理出80多座墓葬。

2006年5月25日，花厅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筹建考古遗址公园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花厅遗址，新沂规划建设一个集遗址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研学、文化旅游为一体的遗址文化公园，希望能将其建设打造为大汶口时期的文化地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载体。

花厅遗址原本就位于马陵山西麓，距离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的热门游览路段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向西二三十公里便能到达位于大运河畔的窑湾古镇，周边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贺云翱表示，花厅遗址还留下许多未解之谜，比如，是否有城墙、护城河、建筑区？为何北区是高等级墓葬区、规模更大，南区则是小型墓葬区？整个花厅遗址的平面布局究竟怎样？等等此类问题。在他看来，5000多年前的花厅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的中心，这个融合南北文化的聚落所拥有的文化内涵、经典意义还有待深入发掘，这更需要继续做好花厅遗址的全面考古工作。厘清地下文物与布局，深入研究花厅遗址及其在泗水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化融合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规划，后续通过开展现代化数字博物馆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现更多深埋于历史深处的花厅故事。

“花厅遗址及其文化类型是属于淮河重要支流泗水流域的文化体系。淮河是一条文化地位独特的重要大河，应该重视淮河流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重要性。”贺云翱说。

规划中的花厅考古遗址公园，将呈现“两片一轴一带七区”的区域空间结构。其中，“两片”是花厅遗址公园片区和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片区；“七区”则包括遗址展示片区、生态景观展示区、民俗文化体验区、博物科研展示区、现代农业展示区、花样农田景观展示区和花厅文化演绎互动展示区。

图为在花厅遗址周边已经建成的房车宿营区。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位于浙江嵊州金庭镇的华堂村文化积淀丰厚，保留了一大批明清以来的街道建筑、民风民俗和人文景观。

（**本文配图均由沈琪霞摄**）

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乡村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是乡村记忆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

浙江千余历史文化村落

讲述历史人文故事

陈毛应

浙江调研千余历史文化村落

凝固的民居，古老的村落，跳动的民间社火、延续至今的活力……众多专家、学者等历时多年，调研散落在浙江各地的千余个历史文化村落，并汇编成集《千村故事》丛书。

“社科学者们以‘工匠精神’开启了抢救文化历史的新探索。”湖州师范学院金佩华研究员是《千村故事》总主编，他认为，“通过‘浙江历史文化村落’这一视角，不仅为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学术支撑，而且对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村落，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据介绍，“千村故事”主要针对纳入《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有数量和名单库》的1237个村。此次调研旨在寻访传统故事，定格乡土印象，回味乡愁记忆并以此构建当代精神家园。

“此次研究成果，既秉承了对地方志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更完美的精神理念，又实现了对当地文化深层肌理的梳理挖掘和研究，成为当地文化的发现者、代言人、传承人、传播者。”金佩华说。

位于浙江楠溪江中游西畔的岩头村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村落，人文景观丰富。

图为岩头村一角。

有1022个村落还保存着族谱

《千村故事》讲述了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历史人文故事，也可以从中看到村落里的生态人居、经济社会、制度习俗、传统工艺、人物传记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由此，人们可以感受江南历史文化村落变迁兴衰更替的历史脉络。

位于嵊州西北部的崇仁六村正是浙江千余个历史文化村落中的一个。走进村子，就宛如进入一座江南古民居建筑的博物馆，沿着寂静的卵石巷道缓缓前行，建筑布局古朴浑然、精美奇崛。

崇仁原名杏花村，北宋时，受皇帝敕封的义门裘氏从婺州分迁此地。裘氏以崇尚仁义为本，故名其地为崇仁。

令人欣喜的是，村中至今存留着许多老台门。崇仁六村又被人们称为“崇仁古村”。古建筑群基本保持明清风格，尤以五联台门和玉山公祠最为典型。2000年1月，以崇仁六村为核心的崇仁古村落被列为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区；玉山公祠也在此前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历史文化村落基础信息有效采集的1158个村的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主要集中在浙西、浙南、浙中的山区、丘陵地区；而在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地区、海岛地区的相对较少。

从建成年代看，浙江这千余历史文化村落中，唐代及以前始建的村落160个，其中舟山市定海区马岙村被誉为“海上河姆渡”；宋代始建的村落尚有367个，占总数的31.69%；元代始建的有103个，占8.89%，明代始建的有297个村，占25.65%，清代始建的有149个村，占12.87%。

另据介绍，村落中所有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存中，有文物保护级别的共有4357处，其中国家级文物有375处，省级文物有699处；村落中有1022个村保存族谱，有295个村落保存有古书、名人手稿、字画等文物资源。此外，村落中有906个村有古树名木，有的村甚至有古树名木群。

崇仁六村是浙江著名的历史文化村落。走进村子，就宛如进入一座江南古民居建筑的博物馆。

延伸阅读

浙江的“历史文化村落”涵盖了浙江省省域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和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与民俗风情村等。

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

多渠道的保护利用方法

数千年来，勤劳智慧的浙江居民世世代代辛勤耕作，在浙山浙水之间聚居，形成了众多传承文化并铭刻乡愁记忆的历史文化村落。如何保护、传承与利用这些珍贵资源，一直备受各方关注。

“对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既是人们珍重和热爱中华文化的表现，也是中华文明世代传播传承的历史见证；既是应保留的历史，更是‘活’在当今人们生活之中的现实。”湖州师范学院“两山”理念研究院教授王景新这样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始，浙江就着手探索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方法。2009年，一批国内古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聚集浙江省建德市新叶村，提出了《新叶共识》倡议，推动将文化遗产保护和民生工程结合起来，倡导全社会关注抢救正在日渐消失的中国乡土建筑。2012年，浙江出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全面启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工作。

在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实践中，以西塘、诸葛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村落，已经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保护利用之路。

岩头村位于浙江楠溪江中游西畔，人文景观丰富，至今仍保存着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和部分宋、明、清建筑，其中建于宋元年间的古村、古塔、古桥、古牌坊保存完好。位于浙江嵊州金庭镇的华堂村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嫡传后裔的聚居地，文化积淀丰厚，保留了一大批明清以来的街道建筑、民风民俗和人文景观，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